简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安全

张澜涛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经济系，北京 100091）

[摘要] 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国体性质所决定，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适应具体国情和现实发展的需要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必然使基本经济制度在实践中充满着风险，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的安全成为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维护基本经济制度安全，实质上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发展经济的有机统一。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和谐和可持续的发展，从而从社会制度上确保我国经济安全。

[关键词] 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安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6)增刊-0019-07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与其它经济范畴一样，基本经济制度也有风险与安全问题，认识这一问题，对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定义和内涵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强调要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对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解主要有：

（一）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国体性质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马克思说："共产党人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而不论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1](P.285)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社会关系、利益分配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公有制的本质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是消灭剥削、实现劳动者解放和共同富裕，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

（二）所有制形式取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即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需要一个相当长并且不可逾越的经济起飞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基本经济制度是与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多元化和发展不平衡决定的：国民经济中既有高科技、大规模和集约化工业化的生产力，又有手工业和半机械化生产，多种生产经营方式并存；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存在较大的三大差别；计划经济残余浓厚，表现为宏观管理制度缺失和水平欠缺。基本经济制度正是基于现实生产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力水平参差不齐和不平衡国情的产物。

(三)实际发展的需要。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不是教义,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1](P.210)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公有制经济处于支配地位,它将其它所有制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成为发展的动力。私有制是商品关系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理论上社会主义是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践中私有制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它扩充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内涵,在市场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年来,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8.5%,而私有制经济达到25%以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私有制经济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就业方面具有独到作用:个体私营经济大多从事第三产业,占全国“三产”的86%;成为扩大就业主渠道,新增就业人口的65%,再就业人口的90%,农民进城务工的近100%,都就职于私有制经济中。此外,私有制经济对丰富市场,扩大税源,改善人民生活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等都具有积极作用。

(四)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分配形式就是在劳动力私人所有的基础上,并根据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在商品生产经营中所起作用和效益的大小,从经营收益中获得相应报酬或收入。

(五)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三个有利于”。邓小平指出,判断改革和一切工作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2](P.372)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是其先进性和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发展生产力不仅是单纯经济意义的发展,还包括综合国力的发展,以实现民富国强,“每个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是中介目标,终极目标是提高人民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

二、基本经济制度所面临的风险

社会主义在中国依然是“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必然使基本经济制度在实践中充满着风险,维护基本经济制度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我们应居安思危,正确认识基本经济制度的各种风险,这是维护其安全的重要前提。

(一)政治体制与经济基础矛盾的制度风险。恩格斯认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一是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就可以发展得比较快;再就是阻碍或扭曲。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3](P.483)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高歌猛进,经济已经基本实现市场化,但政治体制对经济基础在制度、体制和机制方面还存在阻碍和风险。

1. 权力集中,政资不分,以权代法等问题未从制度上根本解决。人民民主参政渠道不畅,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乏力,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和腐败蔓延,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官僚行政、机构臃肿、奢侈浪费、盲目决策等问题丛生。

2. 国家垄断痼疾难除。建国初期,基本照搬的原苏联发展模式是以国家垄断为特征的,并很容易与我国“官本位”制度传统结合。国家垄断主要表现为行政直接控制资产经营和价格,行政把持重要资源。行政垄断既是对市场机制的破坏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也造成寻租腐败的制度条件。

3. 缺乏实现民意的法律机制。人民利益是抽象概念,现实是每个具体人或群体的生活利益,社会绝大多数人是以自身需求为准和分散活动的。如果缺少民众与政府之间有效沟通的机制,政府决策就很难协调好现实中分散和多元的利益诉求,产生民生需求与决策的矛盾,引起民众对政府的误解和不满。长此以往,势必弱化人民对政府决策的认同、信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任和支持。

4. 产权制度缺失。产权制度是由既定的产权关系和产权规则组合而成、并能够对市场经济中的各种产权关系及其利益关系进行有效的组合、调节和维护的法律制度安排。它是市场经济特有和必需的规则。这方面的主要问题是：

(1)资源利用的无序性和非理性。产权形成与资源稀缺性紧密相关，某种资源如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无需产权界定和保护。但实际上资源越来越稀缺，若无产权制度规范，必然导致普遍浪费，并异化竞争，加剧资源矛盾与冲突，引发各种不正当手段破坏市场资源配置。因此，为维护资源的公正交易、合理配置和公平竞争，必须建立产权制度。否则，对资源的垄断强占、寻租腐败、欺诈造假、奢侈浪费等问题很难杜绝。

(2)国有资产保障软弱。目前我国虽确立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则，但由于缺少具体和谨密的产权制度，国有资产投资和经营普遍存在产权主体缺位或管理失当、权责利分离等问题，使国有资产遭到严重侵害和流失。

(3)不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产权制度影响交易成本，当某种资源产权未界定，一人要利用，或避免他人用时对自己损害，须与这一资源所有可能使用者谈判，以确定资源产权。由于谈判范围模糊，交易费用很难确定，资源效益预期下降。一旦产权确定后，谈判对象明确，交易成本必然下降。因此，产权制度有助于市场预期和降低交易成本。现实中，国有资产最终所有者是国家，而国家可由若干机构或官员代表，使国有资产产权多元和模糊，常常是“政企不分、官商联营、令出多头、利缴多方、高额成本、低效管理”。产权弊端大大削弱了国有资产的增值力。

(二)“公仆”变质危险。基本经济制度中权力和资产都掌握于“公仆”手中，两者交换或结合，极易导致“公仆”腐败和异化，形成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危害。异化指主体自身发展中产生出一种反对或支配本体的对立面。马克思认为，公爵与鞋匠的天赋差别，要比家犬与猎犬的差别小得多。此理，无论“公仆”何等聪明正确，权力和地位也无法使其变为“超人”；无论“公仆”如何诚挚声称自己是真正代表民众利益，但实际上，高贵地位并不造就他们必然格外高尚和英明，凡属于天生的人性弱点他们自然也有，与常人不同之处仅在于后天自我塑造和机遇。在权力和财富生活中，如果缺少法律制度的监督和制约，谁也无法保证“公仆”的后天觉悟永恒不变。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先进的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民主的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有机统一，党的先进性的最重要体现在代表人民利益执政，因此，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应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还必须建立起“权力在民”、对“公仆”进行严密有效监督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否则，“公仆”变质，利用权力和资本谋取私利，必然改变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三)改革和发展的社会风险。我国正处于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嬗变时期”。国际上称为“风险社会”，表现为突发性公共事件事故频繁高发。主要成因有：

1.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进入人均 GDP达1000～3000美元发展期时，各种社会利益关系会有很大分化改组，矛盾凸显，各种社会突发事件频率及规模呈不断上升趋势。据统计，1993～2004年，全国群体性突发事件从 8709件增长到 7万多件，涉及人数从 70万人增加到 380万人。这表明，我国社会利益矛盾越来越尖锐和严重。

2. 近年来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意外事故和灾难不断发生。例如，SARS事件、毒品泛滥、艾滋病扩散、禽流感隐患、矿难等等。2005年，全国自然灾害造成 1855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992亿元；各种生产安全事故 6.91万起，死亡 119827人。恶性事件的多发态势严重冲击社会正常生活秩序，使中国社会明显具有“风险社会”的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具有不断扩散及人为的不确定性必然事端；二是导致现有社会结构、制度和社会关系向更加复杂、随机和分化状态转变。“风险社会”还表现为社会利益分配失衡、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在社会福利、教育、国企、医疗、土地开发、住房等事关社会大众直接利益的制度改革中，忽视或损伤了工人、农民等下层群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体的利益；因盲目追求“政绩”忽略环保和生产安全；人口增长就业压力加大和国外资本进入使竞争更加激烈，功利至上的社会风气愈发时兴；一切都使人们心理越来越浮躁不安且承受力减弱。

3. “风险社会”更深层次原因。美国学者李普塞特认为，一个社会稳定与否是不能由它所产生的满足程度或挫折程度判断的。占统治地位的特权阶层在社会中握有强权，与社会大众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地位来接受他们的特权和负担相比较是否适当，是决定社会稳定的一个更重要原因。这意味着，强势集团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与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缺乏基本和公平的博弈或协调，才是中国社会最大的风险因素。无论我们多么不愿意承认，事实上，几乎所有掌权者与富人之间都有联系，结成联盟和利益互动关系，居于对资源财富的社会垄断地位。在社会公正的利益分配协调机制和福利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社会利益分配失衡和不公趋势。

4. 国际竞争风险。全球化使国际竞争风险加剧，我国经济逐渐全面开放，直接面临国际风险和挑战。国际经济中，发达国家拥有资本技术优势，有制定国际市场“游戏规则”的主导权，占据国际竞争有利地位。在经贸关系中，可利用资本技术垄断获取高额利润，转嫁危机和不良产业；同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必然通过“经济殖民化”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渗透和侵蚀，甚至用封锁、禁运或制裁等手段压制我国经济发展，使中国应对国际经贸冲突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公有制经济作为对外经济的主体，必然承受各种国际风险，因而规避国际风险成为基本经济制度安全的重要内容。

(四)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国有资产是指国家依据法律和主权取得和确定的资产以及各种形式企业投资和收益形成的资产。“流失”是指国有资产的亏损、国有企业破产、国有资产被贪污盗窃和浪费，国有银行资产的呆坏账，国有资源财富的损毁，境外国有资产的丢失等。截止2004年末，中国国有资产总计约12万亿元。作为社会财富，必然成为各种不良不法分子所觊觎图谋的对象，流失风险日趋严重。据统计，1991～2001年，中国国有资产向海外流失约2500亿美元，而且流失问题在各地区、部门和企业普遍发生，情节严重已到了不可容忍地步。

(五)政治改革滞后。我国市场经济非自然形成，而是国家运用权力构建的“行政造市”，在许多经济活动中权力代替市场机制；同时，商业行为渗透到政府中，形成多种隐患。

1. 政府对资源行政直接控制改为市场间接控制，但并没有彻底解决控制权力赋予规范和对权力监督制约问题，使以权谋私有较多机会。市场经济的权威是法律，而不是政府。但政府将立法和行政集于一身，市场的公正和透明必遭扭曲。例如股市，因政府造市、行政监管，极容易造成暗箱操作、垄断经营，使大量资金被套牢和蒸发，违法违规事件层出不穷，股市危机四伏。

2. 市场运行风险。我国经济虽高速增长，但由于分配机制不合理，使市场容量未能有效扩大，形成市场疲软和潜在危机。同时，泡沫经济不断加大。从1991起，基建投资高攀不下，房地产价格急速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重。其中，房地产泡沫极为突出：据统计，2003年，上海的高档住宅约18%空置；北京商品房空置率25%；深圳高达34%。全国房地产空置率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的15%，其泡沫蕴含的风险已相当严重。

3. 极度庞大、臃肿和昂贵的行政管理机构。据统计，中国官民比例1981年为1∶67，1990年为1∶40，2003年为1∶26。这一比例从纵向比较，比清末高35倍，比西汉高306倍；横向对比，是美国的28倍，是德国的36倍。虽然，几经“精简机构”，但结果实在不尽人意。中国在编干部，1979年为279万，1997年约800万。2003年仍高达710万。官多必然花销大：2005年全国政府机关的车马费总计约3200亿；招待费2800亿；出国“培训考察”费300亿，几乎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30%。1978～2003年，全国行政成本增长了87倍，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幅度。臃政沉疴已是中国政体的最大弊端，并形成腐败的土壤，时刻威胁着基本经济制度的安全。

4. 仍存在被“和平演变”的危险。随着中国经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济的发展，西方国家与中国在社会制度深层次矛盾日趋凸显，因而遏制中国“和平演变”攻势一直未断。“美国把经贸关系作为促进中国发生变革的重要手段。利用经济和科技优势效应，强化意识形态渗透。用巨大的经济磁铁，来吸引社会主义国家更加靠向自由世界。”[4] 另外，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拜金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意识的最大侵蚀。网络使社会信息更加透明，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容易形成社会信仰危机和偏激盲从，对基本经济制度构成“舆论风险”。

5. 我国面临许多实际困难和问题，解决不好将对基本经济制度造成损害。例如：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全国每年需新增 1500万个就业机会，而目前只有 1000万个，全国现有 2.7亿人口未能充分就业。普遍“剩余经济”的产能过剩和商品滞销，使许多企业库存加大，资金积压，效益下降，甚至面临破产倒闭。如用世界银行的 0.2美元/天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许多农民生活仍处于贫穷状态，全国还有 600个贫困县，3200万贫困人口，约 3.4亿的半文盲。中国尚未有全社会普及的养老保险体系，如健全约需 4000亿美元。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最严重国家之一。要恢复到 20世纪 70年代面貌，需环境治理费 8000亿美元。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耗费了大量资源，而且对资源需求越来越多，使资源供给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日益突出。

6. 决策失误构成经济不安全因素。我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 9.6%，人均 GDP为 148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经济发展愈快，愈会产生更多新问题；因为经济发展是财富增长与利益调整同步进行的过程，财富增加使人们利益关系愈发复杂，差距日趋加大，但人们主观却对分配公平有更高的要求。按照“帕累托定理”，社会发展使一部分人利益改善引起整个群体利益改善，同时任何人利益都没有受损，这才具有改进意义，才能实现社会平衡和进步。然而，经济高速发展并不必然达到“帕累托改进”，更多是一种非均衡发展，其中最突出是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如果社会福利普遍欠缺，将使问题严重化。这时，国家决策应谨慎，力求公正与得当，否则就会加剧利益失衡或激化社会矛盾。例如，我国医疗、教育和城镇居民住房“改革”直接关系广大群众切实利益，在相关福利制度缺失情况下，决策后必然引发剧烈的利益波动：一方面造就了一批相关产业的富翁，另一方面也加大了许多居民的生活困难。

三、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安全

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安全，实质上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发展经济的有机统一：

（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维护基本经济制度安全实质上是从社会制度上确保我国经济安全。

1. 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经济是维护基本经济制度安全的核心。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增强综合国力具有决定作用。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统一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之中。

2. 深化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改革。公有制的先进性主要是促进生产力，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随着生产力变化而改革完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是数量的简单增长，而是结构和质量的提高。在市场经济中，股份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因而要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进行资产重组，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主要产权形式，特别应重组垄断行业资产，以破除行业垄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产权主体多元化，实现产权置换和优化重组。

3. 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我国加入 WTO后，外资大量进入，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因此，应对国有经济布局实行战略调整，以解决战线过长、布局分散、规模效益差、重复建设严重、机构赘置等问题；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落后状况；集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资金投向关键部门、基础设施、高精尖技术领域，实现国有企业的产业升级、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从根本上提高其国际竞争力。

4. 完善分配制度是维护基本经济制度安全的关键。

（1）产权改制最终要体现于利益分配。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原则是“效率与公平统一”，以此建立分配机制和法律保障。效率以利润体现，是市场客观效应，国家不必过多干预；无法自发实现公平是市场缺陷，由于“按权分配”还较严重，缺少规范的公平标准，因此，维护公平才是政府的首要职责，而不应只是“兼顾”。国家必须建立起全面有效的工资收入、社会福利和保险、收入调节税、社会救济基金会等法律制度，以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都必需的社会公平。

（2）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实践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容易，但实现共同富裕非常困难。城乡、行业部门、地区之间存在差距，行政不良干预、市场不规范和不公正竞争等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不公。因此，国家应加强规范市场秩序和法制，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与公正，防止两极分化。同时，应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政策和财政的优惠，以促进共同富裕。

（3）政府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应急机制和预案，在资金、人员、物资、技术和措施等各个方面建立起应急抢救机构和制度，这既是国家政治经济意志、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的综合体现，也是切实维护广大民众利益和安全的制度保障。

（4）打击经济犯罪，取缔非法收入。贪污腐败和非法牟利是社会的危害因素，也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威胁。因此，必须对“黑色经济”依法惩处，整顿不合理收入，纠正行业垄断。

（二）实现科学、和谐和可持续全面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仅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科学、和谐与可持续全面发展。这是更高层次和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它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讲究勤俭节约和社会文明的整体推进，关注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本质要求。

（三）深化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发展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协调进步。实践中，残余的计划行政弊端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表现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相当不适应。因此，维护基本经济制度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进行政治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需要。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也在于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P.160-173)坚持不懈地进行反腐廉政，从根本上防止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质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基本经济制度安全的必要措施。

中国经济发展是通过改革实现的，“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2](P.240)同理，经济制度的安全，决不是简单守护，而是制度的除弊兴利和更新进步。只有不断创新与改革，才能真正保持基本经济制度的生命力和先进性。当然，改革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方式，只能在不断探索、不断“试错”的实践中渐进，即改革必须兼顾各方面利益要求，将各种利益目标和选择合理协调与和谐统一起来，将解决群众现实问题与发展目标统一起来。为此，必须依法改革，即根据法规确定改革决策和行动。在改革中，国家应特别关注弱势群体、落后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利益。运用特殊政策给予更多的照顾和优惠。

（四）建立起以人为本、自由民主法制与和谐的社会主义制度。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 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P.186)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和生命核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是"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体。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是自由市场经济，它必然要求上层建筑实行民主政治制度，这样才能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进步。

2. 尊重和保障人权。我国新《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根源于"权为民所有"，尊重和保障人权表明政府一切执政要以人为本，以提高人民利益和自由的权利为目的。保障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权利，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的制度保障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制的核心是宪政，即"治国者先要受治于法。"法制必须体现和服从人民的意志，而不是当权者的意志，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意。

3.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和信用经济的统一体。诚信是人类社会公认和崇尚的道德规范和维系社会经济秩序的准则，更是政府执政的基本政治素养和品质。当前社会的信用缺失相当严重。因此，以法严惩失信违约行为，用法律保护守信者的利益，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当务之急的要务。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核心。"人无信失德，国无信丧本。"建立社会信用制度，首先应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政府的守信，根本在于依法决策，依法办事，增强政策的统一性、透明度和连续性，提高科学决策水平。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美]贝克．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讲话[Z]．合众社，1991-06-12.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齐琳)

·学术信息·

实施综合安全战略，维护中国的海洋安全

海军指挥学院高子川在《试析21世纪初的中国海洋安全》(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海洋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在地理空间上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海洋世纪"的来临和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海洋安全在中国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凸显。21世纪初，中国海洋安全面临的挑战可概括为三大现实问题、两大外部威胁和一大潜在隐患。要有效维护中国的海洋安全，必须实施综合安全战略，并确立以台湾问题为龙头、以中美关系为关键和自主安全与合作安全并举、立足近海与走向远海相结合的原则和方针。

(麒麟)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